

# 一百年

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[1921-2011] **特别报道**

**A4 现代快报** 星期三新闻周刊 2011.6.19 星期日  
责编 倪宁宁 美编 皮伦 组版 陈思武



一群理想主义者在这里完成了建党伟业（图为蜡像情景重现）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路军

快报记者上海、嘉兴追溯一大历程——

## 上海八天，嘉兴一日 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个夏天

兴业路76号有着上海民居朴素中带着些许洋气的特点，青砖黛瓦，西洋雕花呈现各处。在此处天井内穿行，有一种幽静之感。然而，90年前，这种幽静感并不存在，相反，紧张、热烈、警惕，在当年的寓所内外回旋。

1921年7月23日晚，中国共产党一大在此拉开序幕。其时正值夏季高温，上海城颇为闷热。出席会议的有上海的李汉俊、李达；北京的张国焘、刘仁静；长沙的毛泽东、何叔衡；武汉的董必武、陈潭秋；济南的王尽美、邓恩铭；广州的陈公博，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。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。

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内，展有当年的路标等标识，这些承载着历史风云的物品，无声地叙述着时代的背景。

1921年，民国十年，农历辛酉年。搜寻当年的报纸印痕，有“洪水滔天”之感。这年夏，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湖北、山东、河南、直隶、陕西等8省水灾，江浙皖3省受灾最重。沿江沿海风水相激，百余县尽成泽国。黄河于山东决口，淹没情形亦极惨重。7月23日、24日，《大公报》关切洪灾，“大雨连绵，上下两游均已出险”、“近日长江上下游大雨兼旬，水势大涨，汉口、九江、安庆、芜湖口各地已增至44尺。江苏方面亦有电谓南京、镇江水势之澎湃21年来所罕见。”语气急促。

“继以霖霖，哀鸿遍地，惨不忍闻”，是时人的哀叹。而当年民生凋敝，洪灾只是其一。1916年，袁世凯病死，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混战之局面。1921年，各派军阀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仍在不断爆发战争。中国向何处去，谁来挽救中国，成为志士仁人的苦闷一问。

十月革命，给中国的志士仁人吹来春风。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式，尽管在中国后来被证明是不适用的，但是这一场伟大的革命，加速了中国的共产党组织的勃兴。

中国共产党的诞生，在那个沉闷而悲惨的年月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兴业路76号原为出席一大会议的上海代表李汉俊及其胞兄李书诚的寓所，是栋石库门楼房。楼下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之所。

他们。军人的形象，无疑使人们更多地想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。

观赏者的人数众多，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说，纪念馆接待量越来越大，去年达到56万人次，今年肯定会超过60万人次。

“我不知道这样说合适不合适，众多参观者都是带着朝圣的心情到此参观的。”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杨宇这样对记者说。翻开留言簿，尽是崇敬之语，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出现频率最高。不少外国人也在此留下了笔迹。

在纪念馆，有一群上海大学来的大学生志愿者，她们为参观者悉心讲解。1989年出生的图书情报档案系学生贾楠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她告诉记者，不仅她们，90里里也有很多对党感兴趣的，而成为志愿者来此讲解，要“过三关斩五将”。

今天的兴业路与黄陂南路交会，法桐树撑起了一方阴凉。租界的阴森感早已沉入历史，车水马龙间，人们惬意地享受着生活，但是沉静依然是这里的主旋律，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。

今年2月到6月，这里经过了一场“修旧如旧”的大修。有人认为不该修出新楼的效果，不过，这栋楼建于1920年，一大开会时，确乎是新楼一栋。

在一大会址上方，是繁华的新天地商业区，高档酒吧、咖啡厅、茶室相邻而处，这种对比也令一些人不理解。学者们关注的是，新天地体现了整个中国尚待成熟的商业文化。而馆长倪兴祥认为，这种文化与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。他说，这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。

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杨宇在面對快报记者提问时，也引述了邓小平的一句话，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。“南陈北李”缺席一大的“主要创始人”

建党伟业，“南陈北李”居功至伟。

学生联合会和湖北各界联合会的邀请，前往武汉讲学，在武汉发表《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》等一系列演讲，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改造社会就要打破不合理的阶级制度等问题，引起了军阀政府的惊慌。北洋政府获悉陈独秀离开武汉的消息，急忙命令京师警察厅派了一名警察，监视守候在北池子陈独秀的寓所门前，准备等陈独秀一到北京就马上加以逮捕。李大钊得知这个情况后，立即派人到车站，将刚下车的陈独秀接到王星拱家中暂避，随后又转移到李大钊家中。为了摆脱反动当局的迫害，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去天津，然后由天津乘船前往上海。1920年2月的一天，一辆驱车驶到北京朝阳门，在通往天津的公路上缓缓行进。当时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，陈独秀头戴毡帽，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，背心上沾满了乌黑发亮的油迹，坐在驱车的里面。李大钊跨在车辕上，打扮成收账的生意人模样，携带着几本账簿。途中，他们交换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见，并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开展建党的准备工作。

在上海，一大会议会期被确定为8天。这8天，是秘密的8天，也是燃烧的8天。这8天，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：我们诞生了。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自己的真正代言人。

在最终确认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为7月23日的问题上，曾颇费周折。

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由于中央机关屡遭遭到破坏，中共“一大”的有关材料也在战火中遗失。1938年春，在延安，毛泽东决定举行建党纪念活动。毛泽东和董必武只记得是1921年7月间到上海开会，但无法确定具体日子，且由于特殊原因无法向其他一大代表征询，于是决定取月首的一天，即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邵维正开始考证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情况。

陈公博的回忆录中，一段文字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。“七月中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，我睡梦中听到一声尖叫，继而便闻一女子悲惨呼叫……那案子直至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，凶手早已逃走。”查阅《申报》，确有“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，被害者为一年前少妇”的记载，此案发生的时间，确系1921年7月31日凌晨。而中共一大确切的召开日期，以于推8天所得，即1921年7月23日。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，《中共党史大事年表》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。

中共一大虽然是1921年7月23日举行，但是各地代表赴上海，却是早已开始。

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中曾说：“一九二一年五月，我到上海去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。”

1921年7月中下旬，设在法租界蒲柏路389号(今太仓路127号)的博文女校成为一大外地代表们的居住地，他们扮成教师、学生模样，打着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旗号，并在住处开了预备会。

在上海的会议一共进行了6次会议。在7月23日晚的会议上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代表共产国际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，马林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，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。

在24日的会议上，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，并交流了经验。25日至26日，大会休会，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。27日至29日，大会继续进行，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。各地代表在

# 一百年

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[1921-2011] **特别报道**

**A5 现代快报** 星期三新闻周刊 2011.6.19 星期日  
责编 倪宁宁 美编 皮伦 组版 陈思武



1919年5月7日上海市民集会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



为建党鼓与呼的新青年杂志



陈独秀



李大钊

党的性质、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。

不过，“基本一致”的大势下，也并非没有争论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全新的事物，而各地的探索者自然有着各自的经验，出现争论不仅正常，也反映了一大会议的党内民主程度。

一大纪念馆展出有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》这一文献资料（俄文译本），较为详尽地说明了一场一大会议期间的激烈辩论。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杨宇告诉记者，这一文献是董必武、李汉俊在一大会议后起草的报告，由马林带到共产国际。1956年在苏共档案馆发现，但已经没有了中文原版，只有俄文版。

文献资料显示，代表大会的第三、四、五次会专门研究了纲领，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，做出了最后的决定，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。这一点就是党员执行委员会也许会可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。

“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，一方坚持认为，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，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，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。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。在第三次会议上，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。在第四次会议上，辩论更加激烈。一方坚持认为，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，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：人们进入国会，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，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，变成叛徒。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，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，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。另一方坚持主张，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，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四个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，或者说，如果我们不相信总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，那么，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，起义的机会总会有，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，但在和平时期，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。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未能作出结论，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。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，但是，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、省长，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。”

30日晚，一大举行第6次会议。情况突变。

当时，马林正在用英语讲话。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男子闯入会场，朝屋里环视一周，说是要找人，然后离去。秘密工作经历丰富的马林立即警惕起来，断定此人是暗探，要求会议立即停止，大家迅速分头离开。代表们离场不到一刻钟，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车就到了。

关于暗探，专家已有考证。江西师大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、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利生认为，这名暗探

是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，江苏镇江人，与黄金荣、丁顺华是结拜兄弟，人称“黄老大”（黄金荣）、“丁老二”（丁顺华）、“程老三”（程子卿）。

这是一个意外，然而也是一种必然。这番意外，本冲马林而来。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从欧洲来到上海，一路上已经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，并掌握了他的行踪。马林在上海受到租界巡捕房的严密监视，租界巡捕房详细记录了马林1921年6月至12月在上海的化名和几度迁移的地址。

一大会议，面临重新选址进行的问题。最后的方位是浙江嘉兴南湖。这也是听从了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，嘉兴是王会悟的家乡。

烟雨南湖  
共产党的红船自此起航

嘉兴，居上海西南。

此地水乡泽国，为古越人聚居地。1911年11月7日，辛亥革命党人光复嘉兴，成立嘉兴军政府。民国初废府存县，改称嘉禾县，后复称嘉兴县，有禾城之称。

从上海南站，坐普通快车，不到一小时，即到嘉兴火车站。90年前的7月31日，一大会议的代表们分两次坐火车来到嘉兴，想必用时也不甚多。

王会悟在《我为党的“一大”安排会址》中说：“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，与董必武、陈潭秋、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”。

最后的，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机构，由陈独秀、张国焘和李达组成书记处（中央局），陈独秀任书记，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，李达负责宣传工作。

中共“一大”南湖会议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（党章），通过了党的决议，成立了党的领导机构。

经历了上海的一番惊险，中国共产党人的“红船”在南湖起航。毛泽东后来谈：“中国产生了共产党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。”

当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登高烟雨楼，能纵观天下事。6月18日，孙中山下令讨伐直系军阀陆荣廷。6月26日，粤军占领梧州。7月11日，爱尔兰与英国签订停火协议，蒙古宣布独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……这些共产党人，在小小的南湖运筹帷幄，目光炯炯。

“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到明天”，此后的共产党人在沉沉黑夜中呐喊、斗争，给劳苦大众带来了不绝的力量之源。1921年10月13日，粤汉铁路武昌、长沙段工人在武汉党总领导下，为增加工资、改善生活举行罢工。1922年9月9日，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，取得胜利……

今天的烟雨楼前，“红船”静静地泊着，游人如织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和“红船”合影，是最热门的项目，人们来到这里，就是冲着对红船精神的敬意。在南湖革命纪念馆（旧址），老党员照合影，新党员宣誓，成为这里的常景。在馆内，一些留言被展示在墙上。5月30日，一位署名“哈尔滨一个老工人”的参观者写道：“我不是共产党员，但来南湖参观革命纪念馆是我多年的愿望，今天如愿以偿！”

记者发现，在旧址不远处，新馆也已建好。



一大的最后一天在红船举行，年轻的党自此起航